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31冊

理想秩序的探求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研究

李書巧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理想秩序的探求——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研究／李書巧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31 冊）

ISBN：978-986-322-421-1（精裝）

1. 烏托邦主義 2. 中國

030.8

102014820

ISBN-978-986-322-421-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三一冊

ISBN：978-986-322-421-1

理想秩序的探求——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研究

作 者 李書巧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理想秩序的探求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研究

李書巧 著

作者簡介

李書巧，女，1978年生，漢族，河南鎮平人，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公共管理系教師，1999年畢業於河南大學管理科學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獲法學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2006年至今就職於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政治思想、政治哲學，先後在《河南大學學報》、《理論月刊》、《湖北社會科學》等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十多篇。

提 要

儒家思想所安排的秩序體系在近代遭遇挑戰並最終解體導致了中國社會終極理想的缺失，各種關於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思想由此產生。本書從分析烏托邦的基本內涵出發，對近代中國的典型烏托邦個案進行細緻研究，選取洪秀全的「塵世天國」、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和無政府社會三個典型個案，分析了他們所描繪的理想藍圖及其所依存的理論基礎，指出它們的主題、特徵以及存在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烏托邦精神在現實社會中建構秩序的能力，指出烏托邦精神對於現有不合理政治秩序的解體有著積極的意義，但對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建卻無能為力。進而從社會、思想、人三個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結語部分進行反思，指出需要在烏托邦與政治現實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烏托邦對人類政治生活的意義在於其對未來美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對現存社會政治狀況的批判，但烏托邦作為人類對「應然」狀態的期許也因其科學理論基礎的缺失而成為一種想象而非現實的存在。因此，它是不能被現實化的，它必須恪守自己的邊界，也只有當它存在於可能和思想的領域中時，它才保有其豐富的生命力。



目

次

導 言	1
第一章 烏托邦與烏托邦精神	11
一、種種對烏托邦的不同理解	11
二、烏托邦基本內涵的界定	16
(一) 未來完美世俗社會的設計	17
(二) 對政治現實的否定和超越	20
(三) 想像的而非科學思維的產物	22
三、烏托邦精神	26
第二章 近代中國烏托邦典型個案分析	31
一、洪秀全的「塵世天國」	31
(一) 洪秀全完美社會建構的理論前提	33
(二) 洪秀全等關於人間完美社會的理想	35
(三) 對現實社會的揭露和批判	39
二、康有為的大同世界	43
(一) 大同社會的理論前提：三世進化論和 人性自然仁愛說	44
(二) 康有為大同社會的理想圖景	49
(三) 對現有社會制度的否定和批判	54
三、無政府社會：一種關於絕對自由的烏托邦	61
(一) 無政府社會的理論前提	63
(二) 無政府社會的理想藍圖	67

(三) 無政府主義對現有人類制度的否定和批判	71
四、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主題、價值及面臨的困境	78
(一) 主題：理想社會秩序的重構	78
(二)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價值及面臨的困境	80
五、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特徵及存在的差異	81
(一) 特徵：近代性、實踐性和世界化	81
(二)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之間的差異	86
第三章 烏托邦運動與近代中國新秩序的建構	89
一、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	89
(一) 烏托邦理想在現實革命中的感召力	89
(二) 太平天國運動實踐對烏托邦思想的背離	94
二、烏托邦精神與戊戌變法	102
(一) 烏托邦精神與戊戌變法的開啓	102
(二) 烏托邦思維方式對戊戌變法的消極影響	103
三、無政府主義運動：一場失敗的烏托邦實踐	116
(一) 反對現有社會活動的失敗	117
(二) 建設新社會活動的失敗	122
四、結論	126
第四章 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探析	127
一、社會的角度	127
(一) 社會政治制度的危機	128
(二) 傳統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	130
二、思想的角度	131
(一) 儒家思想的烏托邦性格	132
(二) 儒家意識形態的危機	135
(三) 近代西方文明的影響	138
三、人的角度	143
(一) 烏托邦紮根於人類的深層需求	143
(二)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自主性	145
結語：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及其限度	149
參考文獻	155
後記	165

導 言

一、問題的緣起與意義

近代中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伴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重，各種社會政治問題也「蜂擁而至，全面地、『總爆發式』地到來」〔註1〕，造成了近代中國極其尖銳複雜、極其緊迫的政治局面，而同樣的這些社會政治問題在西方是隨著現代化的逐步深入而漸次展開的。這些擺在中國人面前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促使思想界不斷進行反思並迫切希望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以擺脫現實中的困厄。

千百年來，儒家所構築的理想社會秩序雖然從來沒有真正的實現過，在孔孟之後的1500年間，「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註2〕，但它一直是上至帝王下到黎民百姓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理想路徑。到了近代，根據儒家理念所建立起來的現實政治秩序應對各種危機時所表現出來的無能為力使它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欲性受到質疑（理想社會在現實中遭受挫敗並不必然導向對這種理想社會的否定，但中國傳統中的實用主義傾向決定了中國的思想者以社會制度的有用與否來判定其可欲與否），尤其是甲午戰敗更是宣告了這種制度在西方衝擊下的毫無抵抗力，因為甲午戰敗意味著「中國近代傳統中用經世致用來強化儒學事功能力之破產，它清楚表明，既然儒學經過強化事功的變構都不能對抗西方衝擊，使中國立足於民族國家之林，那麼儒家倫理所相

〔註1〕 張星久：《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述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頁。

〔註2〕 朱熹語。

應的社會制度在現代世界中不是一種好的制度」〔註3〕，思想界意識到「並非理學所刻畫的社會制度不可實現，而是實現了後不能對抗西方衝擊，因而不是一種好制度。」〔註4〕儒家理想社會秩序的不可欲性導致了近代中國終極社會理想的缺失，既然儒家的理想社會已被實踐證明是不完美的，甚至是不好的，那麼什麼樣的社會才真正是完美無缺的？什麼樣的社會才能真正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近代的人們，因此重構理想社會便成為近代思想家們苦苦思索的主題，近代種種關於完美社會的烏托邦思想也由此產生。

近代中國烏托邦的誕生是作為對現實危機的一種反應，因此它就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更是一種對社會進行積極干預的力量，這明顯受到了儒家入世精神的影響，這種對儒家積極入世精神的保持使得近代中國的烏托邦具有明顯的本土特色。在這種急於實現自身目標的烏托邦思想的影響下發生了一場又一場旨在現實社會中重建秩序的革命或改革，這些政治實踐的努力和嘗試最終都失敗了，都沒有能力為近代中國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社會，都沒能夠使中國迅速擺脫困境，走向富強。近代的思想家們並沒有從這些失敗中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太過激進，大大超出了當時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反而認為失敗的原因是改革不夠徹底，於是伴隨著一次失敗而來的是更為激進的政治訴求，戊戌運動失敗了，人們便發動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敗了，人們便主張無政府主義，主張進行文化的革命，總之，近代在沒有現狀值得維持的情況下，「激進的力量拼命地發展，基本上中國近百年來是以『變』：變革、變動、革命作為基本價值的」〔註5〕。這種狀況甚至一直持續到1949年後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因此，張灝認為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所謂「革命」這條曲折的道路上〔註6〕。可見，近代中國思想家身上所具有的這種烏托邦精神促使他們選擇了往而不返的激進的革命道路，這對近代乃至現代的中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註3〕 金觀濤：《中國革命烏托邦的起源：論道德理想主義演變的邏輯》，載《亞洲研究》1999年第三十期，第38頁。

〔註4〕 同上，第41頁。

〔註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載《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三聯書店，2004年，第17頁。

〔註6〕 張灝：《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載《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下），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384頁。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來，海外華人學者首先開始從學理上對近代中國的激進思潮進行反思和檢討，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認為五四運動的「徹底反傳統」造成中國思想的斷裂和意識的危機，嚴重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1988 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他認為近代思想家身上所具有的這種烏托邦精神導致中國百餘年來走了一段思想激化的歷程，中國已為這一歷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這種觀點在 90 年代初得到了大陸學者的積極回應，1992 年《二十一世紀》發表了姜義華的《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和余英時的《再論中國現代思想的激進與保守》，隨後姜義華又撰文《20 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義》，兩人展開了關於「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爭鳴，姜義華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百年變革不斷受阻的真正原因在於激進主義的不夠強大和保守主義的過於強大，肯定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價值。學界所存在的這種思想狀況使得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評價導致激進主義思潮的烏托邦思想？烏托邦思想的政治意義和價值如何？烏托邦思想是否需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張力？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便需要從理論的角度對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典型烏托邦思想進行詳細的分析研究，它們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形成的？它們的主題和特徵是什麼？它們對現實政治社會秩序的影響是怎樣的？在它們影響下所發生的革命或改革運動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這便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對歷史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往往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服務於現實的政治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深受激進思潮危害的中國人看來，烏托邦就是一個貶義詞。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快速邁向現代社會，人們愈來愈多地沉浸於追求必需性的日常生活之中，似乎唯有關注於眼前才是真實的，人們失卻了勾畫烏托邦的衝動。人們熱衷於追求現實的物質利益，不再懷抱高遠的理想，「人」被徹底地「物」化，沒有理想與激情，似乎比任何時代都更為遠離烏托邦精神。「烏托邦的消失帶來事物的靜態，在靜態中，人本身變成了不過是物。」〔註 7〕正如英國作家王爾德所言：「一幅沒有烏托邦景色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得一瞧，因為它捨棄了人類永遠嚮往的境域。」〔註 8〕總之，沒有烏托邦

〔註 7〕〔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 268 頁。

〔註 8〕轉引自 Zygmunt Bauman,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6. p11.

精神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社會，失去烏托邦衝動的人類將失去未來，而沒有烏托邦衝動的學者也不可能產生對社會強有力的批判。可見，烏托邦對現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構建和諧社會有著極大的積極意義。因此，對烏托邦精神的思考可以給我們帶來諸多啓示，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烏托邦的價值、意義及其限度。

可見，對中國近代烏托邦思想進行分析與研究既有理論價值，又有現實意義。因此，本書的研究對象是近代中國的烏托邦思想，通過對近代三個烏托邦個案的分析與研究，指出烏托邦追求的目標是完美的政治社會秩序，但在其影響下所發生的革命或改革卻無力在現實社會中建構新的秩序，並分析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在結束語中反思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及其限度，以期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所貢獻。

二、研究現狀

人類關於完美社會的構想可以說由來已久，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正是人類不斷創造出來的這一幅幅希望的藍圖標誌了人類作為一種超越現實的最具想像力的存在。但作為對人在此世的價值進行積極肯定意義上的烏托邦在西方到了近代才真正產生〔註9〕。由資本原始積累所引發的城市對鄉村的無情剝奪催生了一大批以文學形式出現的烏托邦著作，其中的開山之作便是莫爾的《烏托邦》。在資本家對無產者進行殘酷剝削的不義年代，「人們熱衷於烏托邦的創造，而無暇顧及對烏托邦本身的反思。」〔註10〕因此，烏托邦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不過是近兩個世紀的事。烏托邦這個術語是隨著西方文明的傳入而開始出現在中國學術界的。人們大多是在貶義的層面上使用的，通常更為強調其「空想、不科學」的一面，帶有很大程度的主觀感情色彩。可以說烏托邦在中國還未引起廣泛的學術興趣，對烏托邦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從烏托邦的角度對中國的近代思想進行分析整理的幾乎沒有，對具有烏托邦特質的思想的研究大多散落於對某一個或幾個思想家大同思想及無政府主義等的研究中。因此梳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研究現狀就需要對國內

〔註9〕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22.

〔註10〕 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頁。

外烏托邦研究的現狀和國內外中國近代具有烏托邦特質的思想的研究現狀加以分析研究。

（一）當代烏托邦的研究現狀

烏托邦在國外學術界一直是一個比較受到關注的話題，研究者所持價值立場各有不同，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對烏托邦概念的界定也非常混亂，再加上很多學者雖然沒有對烏托邦進行專題式的研究，但都涉及了烏托邦的問題，因此要對烏托邦研究的現狀作全景式描繪，難度可想而知，這裏，我們只能概括性地擇要加以介紹評析。對烏托邦持肯定態度的有布洛赫、卡爾·曼海姆、保羅·蒂利希等。布洛赫從自然、社會和人類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追求美好境界的內在發展趨勢來說明烏托邦具有「客觀」的基礎，或者說烏托邦就是世界的本質，他將烏托邦視為一種「希望的力量」，是人類衝破異化結構、積極行動的根本動力。曼海姆將烏托邦定義為「超越現實，同時又打破現存秩序的結合力的那類趨向」（註11），在他看來，沒有烏托邦的社會，「人便可能喪失其塑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喪失其理解歷史的能力」（註12）。蒂利希從終極關懷的角度出發，指出：「烏托邦的概念依賴於人本質上應該是和可能是的那種東西與人在生存中即在現實中所是的那種東西之間的差別。」（註13）他認為烏托邦在人的存在中的基礎在於人的本質，烏托邦不同於無價值的幻想，他相信烏托邦並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與人一樣長期存在下去的事物。對烏托邦持否定態度的主要有哈耶克、以賽亞·伯林和卡爾·波普爾等。哈耶克從人類社會演進的角度，認為烏托邦違反了社會演進中的自發秩序原理，是通往奴役之路，終將淪落為國家專制權力對個人選擇的殘酷剝奪。伯林將烏托邦視為一種「積極自由」，實質是以集體自由的名義壓制個人自由。波普爾認為烏托邦所提供的理想藍圖和實現手段根本無法用科學方法來瞭解和證明，因而也不能用說服的方法加以實現，只能訴諸於暴力的壓服手段，因此「烏托邦工程」必然導致極權主義。從史的角度對烏托邦進行客觀的純學術研究的有赫茨勒、曼努爾兄弟、庫瑪等。他們大多對烏托邦持同

〔註11〕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96頁。

〔註12〕同上，第268頁。

〔註13〕保羅·蒂利希：《政治期望》，徐鈞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

情態度，在肯定烏托邦積極意義的同時探討其負面影響。此外，鑒於烏托邦概念的混亂狀況，試圖對其進行重新界定的著作有盧斯·利維塔的《烏托邦的概念》等。

國內的烏托邦研究經歷了兩個階段，9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空想社會主義，翻譯了一批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並取得了一些理論研究的成果，如吳易風的《空想社會主義》、李鳳鳴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史》、王蘭垣、余金成主編的《空想社會主義比較論》等。這一時期的研究把烏托邦局限於空想社會主義，在視野、方法、材料上都有些狹窄。90年代以後，國內學者逐漸將烏托邦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出現了一批研究烏托邦的專著和文章。對國外烏托邦研究進行引介評析的有陸俊的《理想的界限——「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烏托邦社會主義理論研究》、陳岸瑛的《不該遺忘的希望——恩斯特·布洛赫烏托邦哲學評述》、劉懷玉的《走出歷史哲學烏托邦》、章國鋒的《關於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龔群的《道德烏托邦的重構》等。從哲學思辨角度來探討烏托邦的哲學意義的有衣俊卿的《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設計之誤區》、賀來的《現實生活世界：烏托邦精神的真實根基》等。這兩部著作「反映了當代中國學者在烏托邦問題上的思想水準」（註14）。從政治學角度對烏托邦的概念及其政治意義進行分析探討的有陳周旺的《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楊紅偉的《論烏托邦的概念及其政治意義》等，新學科的介入拓寬了烏托邦研究的領域。此外，從烏托邦角度進行歷史文化反思的有林毓生的《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郭藎的《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張星久的《淺論黨史上左傾錯誤發生的傳統思想文化背景》、閔樂曉的《走出烏托邦困境——從現代角度對中國傳統烏托邦主義進行審視》等。這些成果已經開拓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的研究領域，構成了我們進一步研究的背景，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理論素材和方法論支撐，但還處於初步階段，本書將繼續對這一領域展開研究。

（二）近代中國具有烏托邦特質的思想的研究現狀

1、大同思想的研究現狀

對近代中國思想家大同思想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不是很多，大多是在思

〔註14〕徐長福：《烏托邦反思：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載《求是學刊》1999年第2期，第22頁。

想史或者專人思想研究中涉及，文章很多，現簡要述之。蕭公權的《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一書將康有為的思想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視野中進行「宏觀」分析，把康有為的大同學說與世界上其他的烏托邦理論進行比較，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級的烏托邦建造者」〔註15〕。閻丹紅的碩士論文《〈大同書〉烏托邦思想與西方烏托邦思想之比較》將康氏的烏托邦思想與西方的做一比較。臧世俊的《康有為大同思想研究》一書較為詳細系統地分析了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形成條件、理論來源、基本內容、內在矛盾，並比較了其與洪秀全、孫中山關於理想社會的異同。其他的一些思想史的著作如侯外廬的《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陳旭麓的《近代史思辨錄》、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張星久的《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述論》等雖然沒有對大同思想進行專門的研究，但都涉及了這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因此對我們的研究有著相當的參考價值。此外，一些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比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林克光的《論〈大同書〉》、張家驥的《康有為及其〈大同書〉烏托邦思想》、L. 普菲斯特的《康有為·柏拉圖烏托邦思想比較研究》、湯志鈞的《孫中山和儒家「大同學」》、戚其章的《論孫中山的「大同主義」說》、李子文的《論康有為的大同思想》、羅峻的《洪秀全、康有為大同理想之比較研究》等。當前大同思想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缺乏整體研究，大部分是作為思想家個人的思想來研究的，而沒有作為整體放到整個近代歷史的背景中來加以研究，從而凸現它的意義和價值。二是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研究，鮮有從政治學的角度進行精細研究並分析它的政治意義。

2、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研究現狀

建國以來對無政府主義的研究由於種種原因在 50 年代處於寂寞狀態，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停頓，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步繁榮起來。專著不是很多，學術論文很多，現概括述之。研究資料有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編》、高軍等編輯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等。徐善廣、柳劍平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史》一書從史的角度較為詳盡地論述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條件，闡明了無政府主義從傳入、流傳、衰落到破產的整個歷史過程，並對中國無政府主義與歐洲的無政府主義作了比較分析，可

〔註15〕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譯者序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頁。

以說，「較集中地反映了1989年前的研究成果」〔註16〕。蔣俊、李興芝的《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一書對無政府主義的各種派別、無政府主義與革命派及馬克思主義分別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無政府主義是隨著中國近代的中心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而出現和發展的，又隨著這一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解決而逐漸消失。李怡的《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與中國傳統文化》一書從中國傳統文化底蘊與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互動關係的角度出發，敘述了無政府主義在與中國文化整合過程中被吸收嬗變的真實狀況，指出其主流傾向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其之所以在中國流行的深層原因在於民族的文化心理興趣，是近年來研究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一部力作。學術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湯庭芬的《試論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破產》、姜義華等的《無政府主義與近代青年運動》、孫茂生的《中國無政府派的政治思想》、顧昕的《無政府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張亞冬的《無政府主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等。目前對無政府主義的研究側重點主要在於對它的批判上，對其積極意義分析不夠。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近代中國可以說是烏托邦思想大放異彩的時代，思想家們一個接一個的構劃理想社會的藍圖，而且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發生了一場又一場悲壯的為社會樹立新秩序的革命或改革，這些革命或改革是否達到了預期的目標？烏托邦思想為什麼在近代中國廣泛興起？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是本書研究的出發點，因此，本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烏托邦在近代興起的原因及其在現實社會中建構秩序的能力。問題本身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取捨。本文研究的整體性要求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將科學研究與價值判斷、烏托邦文本與歷史——社會語境相結合，具體主要採用以下幾種方法：

1、文獻研究方法。我們對思想的研究必須忠於思想的原貌，因此要研究中國近代的烏托邦思想，便需要對思想家個人的著述進行細緻的研究，而不能僅僅借鑒他人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自己的分析和結論立於科學的基礎之上。主要文獻有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的《太平天國》

〔註16〕李怡：《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與中國傳統文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頁。

和《戊戌變法》，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太平天國印書》，古籍出版社的《大同書》、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的《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編》、高軍等編輯的《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等。

2、比較分析的方法。阿爾蒙德曾指出：「比較分析是一種有效而多能的工具，它通過從一個更廣闊的眼界提供各種觀念和衡量標準，增強我們評述和瞭解任何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的政治能力。」〔註 17〕近代中國的烏托邦思想既有形成的共同的時代背景，又因思想家個人的經歷、思想來源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因而要想對此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便需要把它們放到一個寬廣的視野中進行比較分析。

3、歷史社會學的方法。歷史社會學處理「介入」與「超然」關係的方法對於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所謂介入是指它對所考察的人類處境產生同感或者直接進入其中；所謂超然是指它能夠減少對於情緒化的反應以進行清楚認知。」〔註 18〕本文力圖把握二者之間的平衡，既能客觀地分析思想家個人的思想，又能對處於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思想家給予一定的同情並力圖再現其思想產生的情景。

基於這樣的設想，本書主要劃分為四章。第一章在梳理分析歷史上種種對烏托邦不同理解的基礎上，提出本書的界定並分析其涵義。第二章運用所界定的烏托邦概念對近代中國的典型烏托邦個案進行細緻研究，分析他們所描繪的理想藍圖及其所依存的理論基礎，指出它們的主題與特徵以及存在的差異。第三章對烏托邦精神在現實社會中建構秩序的能力進行了分析。第四章從社會、思想、人三個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最後的結語部分反思了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及其限度，指出需要在烏托邦與政治現實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

總之，本書試圖以整體的和發展的視角，用政治學式的思維，結合歷史學的方法，從政治學的角度客觀地分析、探討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所產生的政治影響。

〔註 17〕阿爾蒙德、小鮑威爾：《當代比較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5～6 頁。

〔註 18〕〔英〕丹尼斯·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 頁，轉引自劉曄：《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37 頁。

